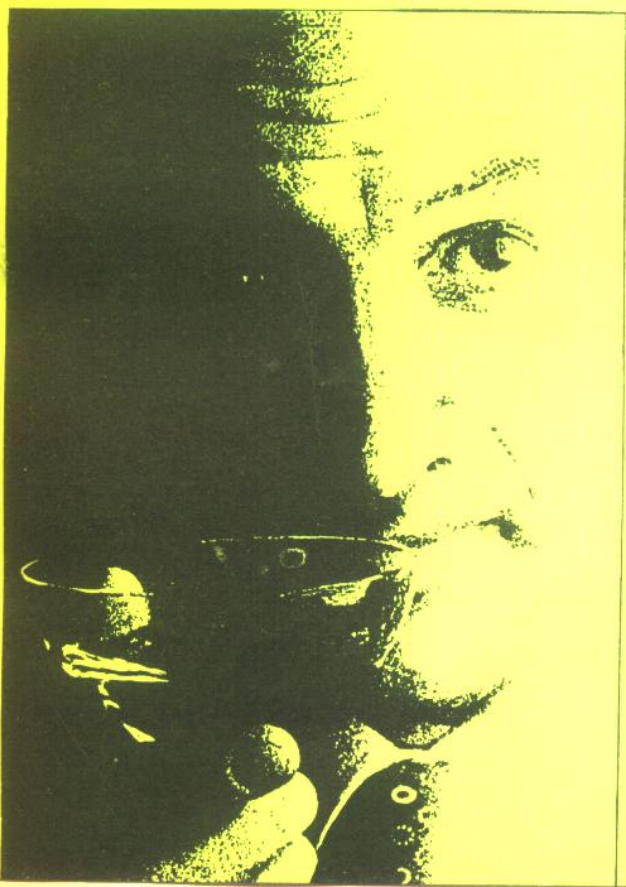


弥天大谎

——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二十五年

〔美〕拉尔夫·麦吉 著



弥 天 大 谎

——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二十五年

〔美〕拉尔夫·麦吉 著

何亚非 译 朱士清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Ralph W. McGhee

Deadly Deceits

——My 25 Years in the CIA

Sheridan Square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983

根据纽约谢里丹广场出版公司1983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王秀琴

弥 天 大 谎

——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二十五年

〔美〕拉尔夫·麦吉 著

何亚非 译 朱士清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5 字数：138,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7003·1097 定价：1.10元

620649/17

内 容 提 要

美国中央情报局究竟是个怎样的机构？本书作者拉·麦吉以他25年的亲身经历作了揭露。

麦吉最初怀着美国式的梦想进入情报局，曾先后被派往日本、菲律宾、泰国、台湾、越南等地，在漫长而坎坷的谍报生涯中，从怀疑失望到满腔愤怒，终于幻想破灭。最后，他认识到：自己完全生活在骗局之中，情报局只是总统秘密行动的工具，它在美国制造谎言、欺骗舆论，在国外策划阴谋、进行颠覆之类的勾当。

本书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揭示了中央情报局的内幕情况（包括其反共反华的活动和诬蔑宣传），颇有参考价值。

作者说明

我在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时曾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因而此书需提交中央情报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核准。该委员会要求隐去文内各种人物的姓名，我已代之以假名，并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加以注明。该委员会还要求我对一些具体地点的地名和描述加以更改，我已照办。此外，该委员会对手稿还作了若干删节。删节处及被删内容的长短，我均在原处标出。（以下从略——译者）

目 录

作者说明	
引言.....	1
第一章 雄心勃勃.....	5
第二章 日本和菲律宾：海外的无辜者.....	23
第三章 华盛顿：档案中的乐趣.....	41
第四章 中国公司的职员.....	51
第五章 在兰利总部的日子里.....	60
第六章 泰国北部：拯救山族.....	72
第七章 总部：蒙骗国会.....	88
第八章 追寻赤色分子.....	94
第九章 总部：鬼影憧憧.....	124
第十章 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篡改现实.....	133
第十一章 回家.....	166
第十二章 在泰国受贬.....	169
第十三章 隧道尽头的曙光.....	182
第十四章 结 束 语.....	190
附：名词解释	

引 言

1968年12月，西贡附近的嘉定省。夜深了，我独自坐在一幢别墅的起居室里，愤懑而痛苦。室内零零落落地散放着政府配给的藤桌、铺有木棉座垫的沙发和椅子。咖啡桌和书架上空空荡荡，表明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房客刚换了新人。一幅镶在镜框中的、象假花似的花卉照片，只是稍微打破了刺目的黄墙的那种单调感。我的前任留下的那盘孤零零的磁带在立体声录音机上转动，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南希·西纳特拉唱的“今日世界多美丽”，后面紧接着一首“世界的末日”。屋外，武装直升飞机盘旋着，远处B-52型轰炸机又将成串的炸弹向南越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投去。

我坐在那里，沉浸在痛苦中，思索着引导我进入这幽僻地狱的种种原因。我的理想主义，爱国精神，勃勃雄心，我那想当一名优秀情报官员帮助祖国与共产主义祸害战斗的计划——但结果都干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非要轰炸我们极力要去拯救的人民？为什么我们要用凝固汽油弹杀害儿童？我为之工作了十六年之久的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要撒谎，不说真话？

我恨自己参与了这场屠杀和恐怖的疯狂游戏，使多少人死于非命，儿童们被活活地烧死，尤其是那些儿童！越南孩子被汽油弹火舌吞没的照片使我彻底绝望了。我要洗手不干，脱离这场大屠杀。我怒火中烧，回想起一年前在泰国的

情景。当时我在泰国乡村工作，我不无痛苦地了解到一些有关亚洲革命的真实情况。共产党人渗透亚洲社会的情况远比我们所曾想象的或报告的要严重，面对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我曾提出过我认为是战胜共产党人的人道的策略。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起先接受了这一报告，但尔后尽管一再证明报告是准确的，它却加以否定呢？在已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法时，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变本加厉地坚持无益的杀戮呢？

我要结束这种叫人发狂的混乱。我想到了楼上我床边那支上了膛的AR-15自动步枪，还想到了床头柜里上着子弹的手枪。我可以自杀，轻而易举。然而我冷静地考虑到，如果我要死，总得达到什么目的，就象在西贡闹市区自焚的和尚那样。或者，我去做一个大条幅，写上“中央情报局骗人”或“中央情报局混帐”，然后把它从情报局的杜克饭店的楼顶上挂下来，自己再纵身往下一跳……。我恨自己，恨自己光想不做，但是我这样一死了之只会给我的家庭带来耻辱，还会带来贫困，因为情报局会进行报复，不发抚恤金。而且即使我能挂起条幅跳楼自杀，情报局也会立即掩盖真相，发表声明说我精神失常。看来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难道我没有这种勇气吗？为什么不从情报局一走了之？但是，我又怎么能负担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和另外两个仍留在家里的孩子呢？象我这样的精神状态，要找到个新的职业是不可能的。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会把我送进疯人院，而不会雇用我。不，辞职是行不通的。我要么一死了百事，要么呆下去，挣扎，忍受，别无他法。我呆望着天花板上刺目的秃灯泡。外面的轰炸暂停了

片刻，短暂的间歇，寂静安宁。我的手颤抖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止不住凄然泪下。我这个昔日圣母学院的橄榄球健将，现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堂堂男子汉，竟象个孩子似地痛哭起来。

正是1968年在嘉定省那间不堪入目的房间里，在我绝望到了顶点的时刻，我萌发了要写这本书的念头。我认识到，我如果继续留在情报局内，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同我目睹的中央情报局可怕的所作所为抗争。我当时就意识到，美国和中央情报局都已深深地走入了歧途。自杀不是办法，我得活下去，把我耳闻目睹的一切公布于众，为了美国人民，为了越南人民，也为了我自己，我应当这样做。

本书记述了我在中央情报局二十五年的历程。从1952年到1977年，我曾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包括日本、台湾、泰国、菲律宾、越南和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我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时在城里，有时在乡下，当过专事秘密行动的情报官，当过准军事人员，当过与外国警察和情报机构联络的联络官，也当过情报分析员。退休后多年来，我仍致力于研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和研究使我悟出不少道理，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其中许多对我来说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现在我决定将这些经历和结论公之于众，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要把中央情报局的本来面目及其实际活动情况展示给仍为其神话所迷惑的人们。我的文章绝无情报局发言人向我们灌输的那些陈词滥调。积二十五年之经验，我的结论十分简单：中央情报局是总统从事秘密行动的得力助手。它的金钱、人力和精力大部分都放在秘密行动上，如支持独裁者，颠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这些活动

我们大家多年来有目共睹。中央情报局不是情报机构。事实上，它主要从事反情报工作，只提供决策者们想要用于支持各种计划的情报，而封锁那些不利于这些计划的情报。作为总统秘密行动的工具，中央情报局惯用假情报来欺骗舆论，其中多数是针对美国本国公众视听的。中央情报局捏造情报的手段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从伪造文件到先安放然后又发现“共产党”的武器窖，但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向决策者提供“情报”。中央情报局不去收集真正的情报作为制定合理政策的依据，相反它经常歪曲现实，凭空捏造为既定政策辩护的“情报”。然后决策者将这些“情报”透露给新闻界来欺骗公众，以骗取他们的支持。里根总统在1981年12月4日的行政命令中授权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开展活动。这样一来，情况只会每况愈下。

但是，除了致力于从政治上了解中央情报局以外，我还要悟出自己生活的真谛，适应真实的世界，摆脱我曾受蒙骗而信以为真的那个神话世界。在写作本书时我知道，我的经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百多万曾在越南服役的美国人 and 在国内的象我过去那样虔诚地沉浸在美国梦想之中的千百万美国人的经历。假如本书能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识到自己是怎么被引入歧途的，美国的梦想又是怎样破灭的，帮助他们适应现实的世界，那么，这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第一章

雄心勃勃

如果真有一种典型的美国人，那么，在去中央情报局工作以前，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我们家在路易斯安那州可上溯三代，众多的苏格兰—爱尔兰裔的麦吉们都长眠在肯特伍德附近的东福克浸礼会公墓里。我父亲十来岁时就北上谋生，几年后返回故乡，同他孩提时代的女友成了亲。她是我家的邻居，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塞卡。1928年，我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莫林。不久，我双亲带着姐姐和我迁居芝加哥南区。父亲当门卫，整天辛劳养家糊口。虽然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我们家却尚能温饱度日。

我是在南区白人的中下阶层街区里长大的。初中毕业后，我进入蒂尔登中等技术学校，学校在几英里外一个种族混杂的地区。我念书认真，加入了优等生俱乐部，被选为班长。作为市橄榄球冠军队的擒挡手，我曾多次在全州和全市获奖。虽然我一直是热忱的浸礼会会员，但球队里两个队友拉我和他们一道上了圣母学院。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为四支常胜的橄榄球队打球。1946年到1949年期间有三次夺得全国冠军。有一年我获得了最佳擒挡手奖。另一年还参加了南北全星橄榄球大赛。1950年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母学院商业管理专业。

我从小就开始受到美国式梦想的熏陶——新教徒的工作道德、真理、正义和自由。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的是英雄和恶棍，黑白善恶分明，耳闻的是为上帝、祖国和世界民主而战的呼唤。我和我的同代人天生就有一种取得事业成就的感觉。胜利的喜悦，经济的复苏，马歇尔欧洲计划以及美国政府为重建一个人类能安全生活的世界而作的努力，都使我们这一代人充满自豪感和爱国热忱，我想，还有一点沾沾自喜。

我坚信圣母学院传奇般的橄榄球教练弗兰克·莱希灌输给我们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努力工作，尽力而为，打胜球赛，生活中你也将会是强者。“啾，小伙子们，”我耳边依然回响着他的教诲，“你们非得付出代价不可，而一旦你作出了牺牲，你就会稳操胜券。”每当运动场中央两队队员排成开球队形，四面看台上挤满了圣母学院忠实的球迷，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刻，也就是我最骄傲、最幸福、爱国热情最炽烈的时候。我伫立在运动场中央，沐浴着明媚的阳光，眼前国旗在飘扬，耳边国歌在奏响，心情无比激动。每一次，我都暗暗地下决心要为我自己，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去奋力搏击。

大学毕业后，我在格林贝帕克斯队的选拔赛中落选，而后在戴顿大学当了一年的橄榄球现场教练，平淡得出奇。我觉得该换个行业了。于是我来到芝加哥，在蒙哥马利区当了培训管理员。但是过了多年的出风头的荣耀日子，这项工作乏味得令人无法忍受。这时，恰如我父母和莱希教练为我编织的美国梦中的一段一样，我接到一份电报。电文写道：“你有意于重要的政府工作吗？工作职责包括出国旅行，涉及类似于国务院的工作程序……”我的肾上腺素的分泌突然

增多，仿佛又听到了无数观众的喝彩声。

1952年1月中旬，在芝加哥市政府大楼里，一位举止沉稳的人同我简短地谈了话，一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闯入我的邻居家，询问有关我的情况（本地的药房老板叫住我父亲，打听我是否与政府方面有什么纠葛）。而后我被召到华盛顿，曾在市政府大楼和我谈话的那个人含糊其词地提到同共产主义斗争的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谈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今后的工作，或是为什么机构服务，但我猜想大概与外交有关系。我的未来可能充满密谋、危险和冒险，我的足迹可能遍及奇域异土，说不定还会遇上一两位神秘的玛塔·哈里^①。我为自己描绘了这么一幅景象：巴黎街头咖啡馆里，我一边呷着法国绿茵香酒，一边与外交人士纵谈重要的外交事务。

我登上午后的列车前往华盛顿，随身带了《时代》杂志和几份《纽约时报》，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世界知识方面的考试。卧铺一收拾好，一块三明治狼吞虎咽地下了肚，我就躺下来仔细地阅读各种最新消息。

报刊上的大标题反映出我另谋新职时的时代气氛。各级法院正在处理国内共产主义分子的案件，案积如山，为方便查询案件，都以城市或团体编号。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正在举行听证会，因为又有一人否认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指控，这一指控说他是共产党员。确实，自从参议员麦卡

^① 玛塔·哈里（1876—1917），居住巴黎的荷兰舞蹈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情报部门当间谍。战争期间，她从许多协约国高级军官那里刺探重要军事秘密，1917年被法国人逮捕处决。——译者

锡宣布他获有 205 名在国务院内工作的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以来，已过去整整两年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正抓住好莱坞里的赤色分子不放。苏联外交部长谴责美国输送中国国民党军队到泰国和缅甸。朝鲜战争烟云正浓，板门店和谈陷入了僵局。杜鲁门总统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警告说，“世界依然处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

这就是我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我在圣母学院的教授们，新闻媒介，政府官员和我的朋友，无不在谈论共产主义的危险和邪恶，谈论铁幕后的水深火热。没有人对政府的这些宣传提出怀疑或质问，大家深信不疑。我显然看到，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正在侵袭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宗教，袭击我们的海外盟友。小拉尔夫·麦吉怀着喜悦的心情雄纠纠地踏上征途，去为政府效力。

近午时分我抵达华盛顿的联合车站，天气寒冷，晴空透碧，使人感到格外清爽。新近一场瑞雪，为首都披上了一层圣洁美丽的地毯。我搭上一辆出租车自车站沿着宪法大道驶去，大道右侧矗立着国家档案馆大楼，古希腊科林斯式的门柱巍然挺立，青铜铸的大门高大宏伟，道路左侧坡顶上国会大厦辉煌屹立。方尖顶的华盛顿纪念碑自豪地耸立着，将对上帝的崇仰之心直送青天。我深信不疑，上帝以他无限的仁爱和智慧将慈爱洒向这伟大的国家。此刻我真是心情激动，思绪万千。我回想起上历史课时曾学过，内森·黑尔为自己仅能献给祖国一次生命而遗憾；沃尔特·司各脱爵士的话最能表达这种感情：“倘若一个人从未想到过，这是我的祖国、哺育我成长的祖国……那么他虽然气息犹存，但却无异于行尸走肉。”

出租汽车在阿林顿纪念桥靠华盛顿这一端的环形交叉处

停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了四幢灰色的木结构楼房，如今已肮脏不堪。其中一幢就是我要去报到的K楼。这些楼房看去似乎建造以来就没有油漆过。楼房四周围筑有八英尺高的铁丝网，仅有几个出入口，令人望而生畏。楼房没有任何标记，看不出里面究竟是什么机构。我从第二个出入口进去，卫兵把我引到一间陈设简陋、破旧不堪的会客室。过了大约十分钟光景，里面出来一个人，鼻上架着眼镜，形容倦怠，阴沉沉地跟我打了几声招呼，嘱我填好几份旅行表格，然后通知我第二天去第九街的人事处报到。他好心地建议我投宿第十七街的基督教青年会，那里住宿条件还不错。

翌日，我去报到。人事处设在福特剧院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之间的一家大商场楼上，人事处主任，我们不妨称他芒森先生，是位瘦小、和气的中年人。他很快打消了我的拘束感，告诉我人事处任何时候一般总有大约四十个人，分散在四个不同的房间里。他们和我一样在等候安全许可，同时接受必要的审查。他说他只能告诉我这些，并告诫我审查期间不得谈论各项考试内容，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妨害安全。后来，不少人都忍不住交谈起来，猜测我们到这里的原因。有人说我们可能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机构。

芒森先生似乎一见面就对我有好感，他问我能否作他的助手，我自然毫不推辞，开始在“决策”办公室工作。作为他的助手，我天天要记考勤，还不时愉快地给拐弯处打字房的女士们送点打印材料。

我们大约每周观看一次训练影片。我很纳闷，因为那份电报曾使我联想到我未来的外交官的生活方式，但这些影片

完全没有这一类描述。有一部影片讲述海军蛙人的活动情况。另一部联邦调查局训练影片，我们戏谑地称之为“白鞋”，原因是里面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新手，脚穿引人注目的白鞋，对一个共产党间谍进行严密的监视。还有一部影片教我们如何撬锁。

我没有通过第一次审查——体格检查。医生发现我甲状腺上长了颗不大的良性肿瘤。幸喜可以治好，经过手术后，我又继续接受审查。别的人运气可没这么好，体格检查通不过就被淘汰了。

大家都在私下悄悄地议论可怕的13号楼，那里进行测谎器检查。谁透露检查的细节就要被开除，这使得猜测和谣言几乎销声匿迹。我至今依然不能披露检查的具体情况，但是维克托·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在他们合著的《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一书中指出，通过测谎器检查，“中央情报局……能查出其雇员私生活中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内容……不但要查问关于可能接触外国间谍等有关安全的问题，而且按常规还要查问有关性生活、吸毒情况和是否诚实等问题。”那时我已与人事处另外两个候审人员一起搬进一套不大的公寓房居住，其中一个私下跟我说，他晓得他的挚友杀过人，但他曾保证守口如瓶，他真不知道测谎器操作员提问时他该怎么回答。为此他十分苦恼。后来他显然通过了，因为检查后不久他就被录用了。然而，仍有不少人经过测谎器检查后被除名。

审查期间，一群年轻人举办了一个晚会，邀请我们不少人前去参加。晚会上一个脾气随和的青年似乎故意与我为难，向我追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为谁工作？为什么来到华盛顿？办公室在哪里？我的本能立即向我发出警告信

号，因此我都套用芒森先生介绍情况时嘱咐的那一套去搪塞他，我们后来把这一套称为供报道的经历。这些经历听起来颇讲得通，其实与事实毫不相干。晚会后没几天，又有不少人被除名。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规定要我们参加的个性和智力测验。中央情报局通过这个测验来鉴别并雇用那些性格外向、守纪遵规、适应性强的。数年后我拿到了这份试卷的副本。细细研读，不难察觉中央情报局从一开始选拔人员就带有的某些弊病。

测验基本上从智力、行为和社交三方面来分析个性。智力方面，情报局寻觅外向者，而不是内向的人。这种人积极好动，重实干而轻思考，非得作出很大努力才能运用理智独立处理问题，并克服某些天性好动的习惯；这种人注重实际，凭“感觉”或靠不断摸索和失败的教训行事。行为方面，情报局喜欢刻板（守纪律）而不是活络的人。这种人只会对一些具体确定的情况作出反应，他们从不注重分析事物，而仅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去了解事物，这种人心理上与世隔绝，主动意识有限，因而一切围绕自我，对旁人麻木不仁。社交方面，情报局要求适应性强，而不是那种毫无能力的人。这种人富于魅力，令人陶醉，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别人，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应付自如。他们知道哪些话是合宜的，并能够确切地表达出来，无论这是否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他们反复无常，随机应变，八面玲珑，还能察觉和利用别人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根据这幅人物肖像可以看出，中央情报局需要积极肯干、具有魅力、唯命是从的人。这种人在社交中得心应手，但分析和理解力有限；看问题简单，黑是黑，白是白，不